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苏轼《进论》中两汉人物的 研究与考辨

科目编号：ULSZ 3068

学生姓名：田伟雄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余曆雄博士

呈交日期：2013年4月5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
第一章：绪论	1
第一节：研究动机与难题	2
第二节：资料评述与研究方法	3
第二章：苏轼嘉祐时期式迹	6
第一节：苏轼在庆历至嘉祐年间的生平略述	6
第二节：苏轼《进论》的撰写背景	11
第三节：苏轼《进论》中两汉人物的甄选考量	15
第三章：贾谊与晁错之形象论述	21
第一节：贾谊的致用与处穷体现	21
第二节：晁错“自全”的性格体现与实践	29

第四章：张良与诸葛亮的“王佐”形象·····	38
第一节：张良对于“忍”的发挥与实践·····	38
第二节：仁义诈力兼用的诸葛亮·····	44
结语·····	50
参考文献·····	53

苏轼《进论》中两汉人物的
研究与考辨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 09AAB03993

日期： 5. 4. 2013

摘要

本文旨在进行“苏轼《进论》中两汉人物研究与考辨”，除了阐述苏轼在嘉祐时期的政治观点以外，还加入一些后人的评论加以论述。在苏轼尚未参加科举考试以前，受到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影响，为日后的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后来，又因受到父亲苏洵的影响，进一步巩固苏轼对历史的理解。嘉祐二年，苏轼以《刑赏忠厚直至论》一文得到省试第二与凭着《进论》、《进策》各二十五篇进士及第，名动汴京。苏轼在《进论》中选择了七位两汉人物来论述并加以评价。在这些人物论当中充分表达出自身的政治观点，并且使用新颖的观点加以论述。对历史有着深厚了解的苏轼来说，苏轼可以从正史的基础下进一步推敲历史事件的发展，更在历史的基础下发表自身对两汉人物的评价。苏轼在两汉人物论中都表达了自身的政治观点，例如忍耐、善处穷时、全其用、必须具有仁义节气与懂得观察时局。苏轼对这些人物采取的评价大多为与前人不一，历代臣子怀才不遇，后人皆将责任归咎于君主；而苏轼却认为是臣子不懂得忍耐，才会出现这种状况。这与就是本论文第二章与第三章所要论述的内容。本文的第三章，主要是论述贾谊与晁错在汉朝当官的一种态度。当贾谊不被重用时就意志消沉，不能振作，苏轼从而否定贾谊这种态度，并提出了贾谊不能全其用，而非君主不能用贾谊。而晁错也是如此，提倡改革方案后惹来各个诸侯的起兵讨伐，但这是晁错却要求景帝带兵，而自己却要求留在城内以自全。所以苏轼对于贾谊与晁错的批评是相当明显的。除此之外，本论文还对张良与诸葛亮两位“王佐”之才作出了论述。在这两位人物中，苏轼对张良的评价较高，因为张良在当时的情况充分表达出“忍”的性格，所以才能协助刘邦

成就大业；反观诸葛亮，开始时以仁义号召天下贤士，但后来又使用诈术驱逐刘璋而占领益州。苏轼对于诸葛亮这种做法是极为反对的，因为当时他是以仁义为出发点，所以否定了诸葛亮的做法。除此之外，苏轼在《进论》中也有论述其他的人物例如高祖刘邦、扬雄、霍光等等，在这些两汉人物论中苏轼都提出了自身的论点，其论点亦相当新颖。苏轼作出如此的评价原因在于未曾经历过政治纠纷与贬谪生活，意气风发，所以才会发表如此的评说。但苏轼所表的观点并不是纸上谈兵，苏轼使用了他的一生来实践他的观点。在他贬官时期，仍然秉持着这些观点，即忍耐、善处穷时以及全其用等观点。虽然也有改变的地方，但总的来说，苏轼的政治观点与政策在嘉祐时期基本上就奠定下来。对苏轼早期人物论研究可以从中得知苏轼早期的政治观念，以便让我们有一个基础，可以更全面了解苏轼的政治观点与对此的实践。

[关键词] 苏轼； 科举考试； 两汉人物； 悲剧形象； 政治观点

致谢

在漫长的求学道路上，论文的撰写让我有了深刻的体会。开始时我觉得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最终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谢的当然是余曆雄老师。皆赖于余老师的细心指导与协助，使我在撰写这份论文的同时，对文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与认识。在与老师交谈中，老师很乐意分享其学术心得，除了提供给我开拓性的意见之外，其研究态度与实事求是的研究精神，给予我相当大的启发，乃至我可以顺利完成论文的撰写。

其次，感谢家人在我撰写论文时给予的支持与包容；以及要感谢一班给予我鼓励与意见的朋友们，因为你们，我并不孤单。感谢你们的支持，让我在期限内顺利完成我的论文。论文的完成，也就是意味着我的大学生涯即将结束，万般不舍。总而言之，我要感谢我的老师与朋友们，感谢你们的支持与鼓励，让我的大学生涯划上一个完美的句点。

最后，有赖于我身边的师长以及亲友们的鼎力支持与协助。在此，本人顿首致谢。

第一章：绪论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北宋文坛大家，亦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苏轼的事迹可以从《宋史》、苏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看出。在《宋史·苏轼传》里头道：“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脱脱等撰，卷三三八，2005：2764）从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在年幼时期母亲已经开始训练他阅读史书了，所以才造就了日后的苏轼。（曾枣庄等著，2010：21）

苏轼的一生跌宕多变，主要是因为仕途不顺而屡遭贬谪，因乌台诗案而入狱，而后又因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而被贬到海南岛。但苏轼却能够应付这种状况，原因是苏轼从政都秉持着忍耐、善处穷时以及全其用的观念。苏轼在被贬谪的期间，也是他文学成就达到顶峰，尤其是熙宁至元祐期间。（曾枣庄、舒大刚著，1999：15）虽然如此，苏轼的文学成就如此之高，原因在于他的仕宦生活不如意，所以苏轼有感而发，借诗词歌赋以及散文来抒发自身的情怀。但是在苏轼生平的前期，即皇祐至嘉祐时期，当时苏轼还没有经过任何的政治纠纷，也没有任何的贬谪生活，他将仕途想成是相当美好的。所以撰写的文章都是相当有理想与憧憬的。（王水照、朱刚著，2004：607）苏轼以《进论》与《进策》各二十五篇取得了进士及第，苏轼在里头对历代的人物、事件、政策都作出了论述，而且在这基础上建立自身的政治主张。而本文只是针对苏轼在《进论》中的两汉人物进行论述。苏轼早期的文章，都是对仕途有着相当憧憬与向往的迹象。而且本文旨在苏轼前期的《进论》中的两汉人物论的形象研究与探讨，虽然有很多学者对苏轼的文、诗、词、赋等进行研究，都是苏轼考取

功名之后的作品，皆有较深入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苏轼前期的文章研究的现象却鲜有研究成果。因此，笔者许多时候都会面临资料不足的困境，需耗更多精神进行文本解读，以挖掘埋藏于文字下的资料。对此，笔者认为苏轼在《进论》里两汉人物的研究尚有发展的空间，值得我们去探讨与研究。

第一节：研究动机与难题

笔者对宋代文学较有兴趣，尤其是苏轼的文章。苏轼被誉为宋代的文坛大家，是一个全方位的文学家，精通诗、词、文、赋等等作品的创作。而许多学者皆沿着这方面进行研究与探讨，苏轼在进士及第后，在凤翔任官，其后更到黄州、密州、杭州等地方任官。（王水照、朱刚著，2004：599）而且文学的创作量也是相当丰富的，其文学创作最鼎盛的时期在熙宁至元祐时期，许多学者都以此为基础，探讨苏轼作品中的情感。但是往往就忽略了苏轼在还未考取功名时期的创作与过程。苏轼在科举考试中一鸣惊人，对古人的论点更是发前人之未发，以及论点新颖，连当时的文坛大家欧阳修与梅尧臣等人都赞叹不已，而苏轼拥有相当惊人的学识，当时年纪轻轻便有如此深厚的学识，连欧阳修都被他考倒了，他这种才能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这也激起了我的兴趣，想进一步去探讨。笔者认为，要了解苏轼的整个文学与政治体系，必须按部就班。首先了解苏轼前期的思想主张，然后才可以从而延伸思考。以前期的作品作为一个门槛与基础，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苏轼的文学与政治观念。

笔者在阅读有关的资料时，发现有关苏轼研究的参考书是相当多的，但是研究苏轼前期的成果却寥寥可数，为此感到相当疑惑。难道是苏轼前期的作品缺乏文学价值所以就不值得研究吗？除此之外，在有限的时间内，笔者仅能将

苏轼《进论》中的两汉人物做出一些论述，并不能相当全面地概括苏轼文章中的两汉人物，但是自此后笔者应当为苏轼《进论》中两汉人物作出更加仔细以及全面的探讨与研究。为此，笔者希望以己微薄之力，为苏轼的研究多增一分论文之量。

第二节：资料评述与研究方法

上述所云，记载苏轼生平事迹的有元朝脱脱所撰的《宋史》、苏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与《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都可以得知。苏辙这两篇墓志铭都是大略记述了苏轼的生平事迹，他是以一个兄弟的角度去撰写的。苏轼研究向来都是热门的研究题目，故这类的研究成功也是相当丰硕的。例如王水照的《苏轼评传》里头就对苏轼的一生以及他的作品风格与政治思想作了一个概述的评论；另外，也有《苏文汇评》、《苏轼研究》等书籍都是针对苏轼的文章以及事迹所编撰的。苏轼在欧阳修所倡导的古文运动熏陶下，所以才会写出如此出色的古文。在冯志弘的《北宋古文运动的形成》阐述了宋代古文的发展进程，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当时后的社会与文坛状况。胡适在《国语文学史》中提及：“这一派文学（北宋古文）的兴盛，引起了一种大转变，产生了北宋古文运动。”（胡适著，1999：23）而苏轼的文风也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但“苏轼《进论》中两汉人物的研究”的课题至今似乎还没有专门的著作以及论文。但是在孔凡礼的《苏轼年谱》、《三苏年谱》中可以得知苏轼写作两汉人物的原因以及动机。然而只能靠有关苏轼的文章内容以及当时苏轼所处的环境从而进一步进行推论与论证，但并不是所有的资料都被引用，因为是研究方向以及论述的内容不符合，所以在此省略。

此论文是探讨苏轼在《进论》中两汉人物的研究与考辨。对于苏轼的人物研究，历来也是备受瞩目的热门题目，但是笔者所选择的则是苏轼较为前期的作品，故不能以苏轼后期的思想为这些前期的作品作一个论述，有赖于欧阳修、苏洵、苏辙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苏轼当时的科举文章以及其风格。除此之外，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也给予笔者相当大的帮助，茅坤对于苏轼所写的每一篇文章都经过评论，所以阅读这些评论让笔者更加了解苏轼的文章。

而本论文是以文史结合的方式为架构，从而探讨苏轼《进论》中两汉人物的形象以及苏轼在文章中所表达的政治观点。而本论文所论述的两汉人物主要集中在贾谊、晁错、张良以及诸葛亮。笔者对于苏轼《进论》中的两汉人物的论述是以“忍”为主轴，从而延伸出各种的讨论。论文的第二章主要是讲述苏轼在科举考试之前的生平、文学思想以及实践。而这三点有助于我们对苏轼生平的论述。除此之外，在苏轼的年少时期，我们可以通过苏辙与苏洵所撰写的文章来论证，同时，也可以用《宋史》证之。另外，笔者还使用了孔凡礼《苏轼年谱》、《三苏年谱》；王水照的《苏轼评传》、《苏轼研究》以及《文渊阁四库全书》等为主要的参考文献，这样有助于论文内容更加扎实与可靠。另外，在第二章里，笔者也会将苏轼《进论》中其他两汉人物例如高祖刘邦、扬雄、霍光等人物作一论述，以便在论述主要人物之前，先让读者明白其他两汉人物之特点。

在论文的第三章，笔者开始对苏轼《进论》中的两汉人物进行论述，并且以《史记》与《汉书》对照，论证苏轼文章中所载的历史是否属实。笔者在第三章对苏轼笔下的贾谊以及晁错进行了评述，并且以这两位人物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本章共分为两节，在里面除了用史书论述苏轼对于贾谊、晁错的功

过以外，还加入历代学者的评价，以作出一个综合性的论据。例如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王文濡的《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孙琮的《山晓阁选宋大家苏东坡全集》以及乾隆御选的《御选唐宋文醇》等等。另外也有参阅一些学术期刊论文，里头的论述是全面的，可以让论文里的论述更加扎实。

紧接下来的章节，都是以史书来论证苏轼对两汉人物的看法。本章有两节，都是着重对张良与诸葛亮的论述。并以《史记》、《三国志》进行论述。除此之外，还加入了许多后人的评价来证明。例如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康熙《御选古文渊鉴》、孙琮《山晓阁选宋大家苏东坡全集》、谢枋得《文章轨范》以及吕祖谦《古文关键》。里头的论述鲜明且全面，让笔者对于苏轼两汉人物的论述也有相当大的帮助。

总之，在本论文里，笔者以史书与后人对苏轼的各种评价为基础，从而探讨出苏轼《进论》中两汉人物的形象，以及苏轼利用这些人物借古讽今以及建立自身的政治主张的准确性与实践性。最后，此文仅是初步的研究基础，笔者希望这份论文能够做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引起更多学者对苏轼两汉人物的研究与考辨。

第二章：苏轼嘉祐时期的事迹

苏轼为北宋的文豪大家，他的一生起起伏伏，从早年考取功名，到晚年的被贬谪到远方，这包含了苏轼艰难的一生。苏轼的生平我们可以分为“在朝—自求外任—贬居”的两大循环，以此为主干来叙述他的生平。（王水照著，1999：19）但本文所触及的苏轼生平主要为他早期刚考取功名的时期，苏轼意气风发，只是初次来应考就有相当不俗的成绩，苏洵一生未曾中举，但是两个儿子却在第一次考试中一举成名，名扬天下。（洪本健著，2004：67）苏轼能够在科举考试中一举成名，有赖于他撰写文章的新颖手法，往往让人猜不透，而且在正史里均没有记载，这就是他独特之处，所以才能在殿试中获得第三等的成绩。以下将探讨苏轼在庆历至嘉祐年间生平简介。

第一节：苏轼在庆历至嘉祐年间的生平略述

嘉祐元年，苏轼与弟弟苏辙随父亲苏洵到开封参加科举考试。依照北宋科举制度，士人应试须先参加州府解试，以取得被举资格。苏轼兄弟因未参加眉州州试，便要在开封府通过举人考试，然后才允应礼部省试，最后还要经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若全数及格，方是进士及第。此年八月，苏氏兄弟通过举人考试，双双获选。在还没有应付科举考试之前，苏轼为了参加科举考试，早在年少时期便作出了长足的准备，所以苏轼的中举与他在文章中所举出的论点不是凭白得来的，是靠着长年的累积积蓄而来的。苏轼在年少时期便精通经史，在这些年里也写过这类的文章。（王水照、朱刚著，2004：45）而这时期的文章与他的际遇也为苏轼后来所撰写的人物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苏轼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在还未赴考场时，就做了充足的准备。最早的时期可以追溯到庆历时期，当时年仅八岁的苏轼就已经开始仰慕范仲淹、欧阳修等倡导庆历新政的人物，在当时就开始向这些人物看齐。到了皇祐二年，苏轼当时才十五岁，在《栾城集》中的《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一诗中提及：“念昔各年少，松筠闷南轩。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文章风云起，胸胆渤澥宽。不知身安危，俯仰道所存。”（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2009：160）那时候的苏轼，由于朋友较少，所以较多的时间是与弟弟一起读书。苏轼在《送晁美叔发运右司年兄赴阙》中提及“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苏轼著、王文皓辑注、孔凡礼校点，1999：1896）因此，兄弟俩一起在南轩里读书，此南轩又名风轩，是一个书斋，里面置有苏洵亲自点校过的藏书。根据苏辙的回忆，当时他们读主要是历史书。（王水照、朱刚著，2004：59）由此可见，苏轼为了准备这个科举考试，每天与苏辙在书斋里念书，对所写的文章都相当有影响力，从这里看来，苏轼的写作手法与人物论的方式在这个时期已经初步完成了。另外，苏轼与苏辙对经史有如此深厚的兴趣与了解，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父亲苏洵。在苏轼兄弟年少时期，便要精心培育两名儿子成才。因此在父亲的督促与指导下，苏轼兄弟们的学术起点相当高，又秉承了苏洵独立思考的习惯，很快便成为了一个学识渊博、见解卓见且果决自信的青年。并且二人都很有自信，认为考取进士绝非难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2001：346）除此之外，在何筵的《春渚纪闻》里提及：“晁丈无咎言：‘苏公少时，手抄经史，皆一通。每一书成，辄变一体，卒之学成而已。乃知笔下变化，皆自端楷来中尔。不端其本而欺以求售，吾知书中孟嘉，自可默识也。’”（何筵撰、张明华点校，1983：503）从引文看来，苏轼当时非常勤奋地阅读史书，为后来的写作做了充足的准备。苏轼除了阅读史书之外，还经常抄录经史，在《真迹目录》里头记

载：“苏长公手录《汉书》全部及《金刚经》……见之记录中。其录《汉书》或为少时事。苏轼凡三经手抄《汉书》。”（张丑著，2005：368）当时十五岁的苏轼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能够熟读史书与经书，乃至后来对于史书的纯熟运用，这个时期的努力是不容忽视的。

在皇祐五年，苏轼当时十八岁，就已经能够写出拥有自己观点的文章，在《苏轼年谱》中记载：“至是岁，日益壮大，好读史、论史，间亦好道。”（孔凡礼著，1998：32）在年少时就开始阅读经史，到了十八岁时便可以以自己的理论点来撰写文章，且理论新颖，发前人之未发。另外，苏轼也在《上韩太尉书》一文中提及：“自七八岁知读书，及壮大，不能晓习时事，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自三代以来，颇能论著。”（王文皓辑注、孔凡礼校点，2004：1381）上述看来，虽然苏轼对于史书的认识程度是无容置疑的，由于早期一直都在书斋里面读书的关系，所以对于当今的一些时事并不是相当的了解，尤其是当时的政治状况，所以苏轼所撰写的人物论才会有如此新颖的看法，因为当时的苏轼完全没有经历过任何的政治纠纷，故意气风发地去参加科举考试。

到了嘉祐二年正月，礼部省试正式举行，当时的主考官为欧阳修，而梅尧臣则参与阅卷工作。当时考试的题目为《刑赏忠厚直至论》，苏轼作一篇古文约六百余字，明白晓畅，轻快通达，既无从前骈体文的雕琢繁缛之病，也全不似当时流行于太学中的奇怪僻涩之古文，表现了苏轼驾驭散体文字得心应手的才能。与苏洵一样不善于作应试文章而屡试不中的梅尧臣，最能鉴赏这样真正优秀的古文，一获此卷即大加推举，要求欧阳修录取为第一名。在《谢梅龙图启》里提及：“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424）由此可见苏轼书写文章的内容十分清晰，一反太学体的

繁缛，内容直接了当，内容也十分新颖。（周楚汉著，2004：210）欧阳修看了这篇文章也十分惊喜赞叹，但由于试卷糊了名，故欧阳修深恐此文出自于自己的门生曾巩之手，取为第一不免找人话柄，故决定委屈此文置于第二。梅尧臣仍感不平，但是他仍然没有打消欧阳修避嫌的心思，结果苏轼就在这次的省试中获得了第二名。到三月份，经皇帝殿试，苏轼赐进士及第，苏辙也顺利通过考试，赐同进士及第。（王水照、朱刚著，2004：62）苏洵艰难一生也为取得功名，然而苏氏兄弟却轻易地一举而得。

在嘉祐二年的考试中，是北宋“得士”甚盛的一次，除了苏轼兄弟之外，曾巩四兄弟，程颐、张载、王安石等人都是日后文坛、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欧阳修惊人的鉴识能力，使他能够把这一批当年杰出的人才收入门下。但在众多杰出的门生当中，欧阳修最欣赏的就是苏轼。（张昶著，2010：23）他曾对梅尧臣说过：“读试书，不觉出汗，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2001：2459）欣赏之情溢于言表。除此之外，在杨万里的《诚斋诗话》里有记载：

坡来谢，欧阳问坡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由“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退而阅之，无有。他日再去问坡，坡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如此，某亦意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杨万里撰：2003：15）

从上述看来，苏轼对于历史已经超出常人的理解了。但是苏轼并没有篡改历史，而是凭着当时的时势加以推敲，可以说是为历史作一个延续性的解说。连欧阳修如此有学问的人都不了解苏轼文章中的论述，可见苏轼撰写论文的造诣之高。

欧阳修还预言苏轼的文学成就不低于他，也就是得到了欧阳修的认同。苏轼凭着《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中举，又凭《进策》、《进论》各二十五篇进士及第，理论新颖的他，为后来的文坛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苏轼待在京城，进士及第之后才出门拜见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又因为欧阳修的引见而结识了韩琦、富弼。自此以后，苏轼成了当时十分耀眼的新星，父子三人的名声大振。除此之外，欧阳修还这样描述他们此番汴京之行的情况：

当至和、嘉佑之间，与其二子轼、辙偕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得其所著书二十二篇献诸朝。书既出，而公卿大夫争传之。其二子举进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学称于世。眉山在西南数千里外，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

（王水照、朱刚著，2004：63）

根据上述所言，苏轼可谓一举成名，更重要的是，他被文坛宗师欧阳修看作下一代的文坛宗主，并预言“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颂，每一篇到，欧阳公终日喜。前辈类如此。……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颜中其编注，1984：8），这里意味着在未来的文坛里苏轼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嘉祐五年二月，三苏回到汴京。因为欧阳修等人的举荐，苏轼兄弟的以参加一次由皇帝特别下诏举办的考试，名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简称“贤良科”，倘若被录取优等，就可期望得到较快的升擢，故此俗称“大科”。按此科考试制度的要求，苏轼事先向朝廷献上他所作的策、论五十篇，系统地表达了他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及对今后施政的建议。制科考试于嘉祐六年九月结束，苏轼的对策考入第三等。这是极高的成绩，因为按宋代“制科”评定对策成绩的惯例，第一、二名皆为虚设，实际等级最高的就是第三等，其次为第三次等、第四等，最低为第四次等，因为第五等为不及格。自北宋开制科考试以来，惟有一个吴育获得过第三次等，余皆在第四等一下，故苏轼这次的成

绩是破天荒与史无前例的。而苏辙因为指责时弊过于激烈，涉于不逊，结果只获得了第四等。他们的荐主欧阳修非常高兴，又在书信中写道：“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2001：2478），由此可见欧阳修十分欢喜，而苏轼兄弟二人再次给汴京带来了轰动。

根据《苏轼年谱》的记载，苏轼兄弟在考取功名后，都各授官职，即：

苏轼入三等，辙为四等。轼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辙除商州军事推官。（孔凡礼著，1998：93）

考完试后，苏轼被任为大理评事、凤翔府判官，而苏辙则被任为商州军事推官。

苏轼于嘉祐六年年底的时候，告别父第单独赴任，正式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第二节：苏轼《进论》的撰写背景

嘉祐年间，苏轼为了应付科举考试的需要，无论是人物或制度，都做出了相当详细的论述。除此之外，苏轼的《进论》与《进策》各二十五篇，还道出了苏轼年少时起的为官之道。苏轼认为从古至今，不是君主不识人才，而是为官者不能洁身自爱，却只会怨天尤人。从当时苏轼的文章看来，可以看出苏轼本身对于仕途的热衷与追求。

其实，苏轼会撰写这类的文章，与他从小的学习环境不无关系。庆历三年，当时苏轼只有八岁，开始跟天庆观道士张易简读书，也开始知道了天下有韩琦、欧阳修、富弼与范仲淹等人，是当时的人杰。在《苏轼年谱》有记载：

入小学，师张易简，与陈太初同学。受李伯祥之贺。（孔凡礼著，1998：12）当时的苏轼年仅八岁，已经开始懂得仰慕当时的人杰，而当时正值“庆历新政”。在范仲淹与欧阳修二人的努力下，“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

犯颜纳说为忠”（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316）的新风气正在逐渐形成，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更能启发出苏轼对当时社会弊病批评的描写。

在苏轼考获功名时，将其仕途之路想象得相当完美。因为其初出茅庐，从未见识过官场黑暗以及从未经历过任何的贬谪生活。当苏轼为殿试作《进论》与《进策》各二十五篇，里边就是苏轼对于一些历史制度与人物的见解。苏轼之所以撰写《进论》与《进策》，除了应付科举考试之外，还要借助这些议论文来反映自身的观点与思想。在《谢梅龙图书中》苏轼提及：

诗赋者，或以穷其所不能；策论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辄以摈落。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426）

当时北宋有试诗赋与试策论之争。而深有应试体验的苏轼就提出上述的论点。他认为诗赋体现了古代人的简与约，而策论则体现了后世取人的详且难，无论主张哪一方都好，其主张都必须达到体恤天下的作用（赵维平著，2003：19），从而达到国富民强的作用。我们知道苏轼在撰写两汉人物论的议论文除了要应付科举考试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要借此来建立自身的政治主张与借古人表达自己对当时局势的一些观点。首先，苏轼认为凡是都要忍耐，有耐心与毅力才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其次为苏轼在文章中崇尚纵横之术，当他在论述仁义利害的时候，这种纵横的气息更能表现出来。苏轼在区别仁义利害的时候，分别将他应有在皇帝治国的表现上，而苏轼在两汉人物中表现出他以仁义治国的愿望，也代表着他提倡以王道治国。但是苏轼更重视的却是政治的实效，也就是说皇帝所实行的措施会不会为国家带来富强，若不能，那实行王道也是徒劳的。

另外，在苏轼的文章中，《进论》里二十篇人物论中两汉人物就占了七篇，可见苏轼相当着重对两汉人物的论述。本文将论述苏轼的其中三篇有关两汉

人物的文章，分别为《贾谊论》、《晁错论》、《留侯论》以及《诸葛亮论》。这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中有详细的记载：

其中《中庸论》三首，见《文集》卷二；《秦始皇帝论》、《汉高帝论》、《魏武帝论》、《伊尹论》、《周公论》、《管仲论》、《孙武论》二首、《子思论》、《孟子论》，见《文集》卷三；《乐毅论》、《荀卿论》、《韩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霍光论》、《扬雄论》、《诸葛亮论》、《韩愈论》、《大臣论》二首，见《文集》卷四。（苏轼撰、郎晔注，卷七，1957：89）

从上述看来，《进论》二十五篇里，就有七篇是论述有关两汉时期的人物，分别为《汉高帝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霍光论》、《扬雄论》、《诸葛亮论》。在这七篇文章中，我们都不能发现除了正史之外，苏轼将自身的意见与一些当今社会的现象加以论述。

当时苏轼刚刚进士及第，将所有事物都想象得相当美好，并没有想到政治的黑暗。例如在《贾谊论》中，苏轼否定了前人的看法，认为他的不遇是自身没有洁身自爱，没要做到“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朱熹著，2008：351）的做法，认为只要保留有用之身，将来一定会受重用的。苏轼在大部分的人物论中都表现出这种观点，原因是苏轼没有经历过任何的政治失意与贬谪。从一开始就是考中省试，殿试，没有任何考试落选的失落感。所以他的文章才会体现出发奋图强，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敢进言的看法。苏轼这一系列的文章，都有着叫人忍耐以及等待机会的意义存在。在他认为，忍耐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条件，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必须洁身自爱，等待时机，切勿操之过急，以免弄巧反拙。这些文章多从古人史实中延伸开来，立意新颖，往往出人意料之外，而又合情合理，表现了作者独创的思维能力，应该说是苏轼议论散文中的

优秀之作。就好比说再嘉祐二年所发表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样，连欧阳修也分辨不出这是史实还是苏轼的推论，可见苏轼撰写文章的造诣之高。（王水照、朱刚著，2004：65）而这些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与前人有很大不同，体现出苏轼独特的历史观、政治观和价值观。

除了应付科举考试之外，苏轼的两汉人物论也深受唐宋八大家其他七大家的影响。苏轼文章内容丰富、用典甚多、观点新颖、气势豪迈，连当时的文坛大家欧阳修也对他赞叹不已。中唐时期，由韩愈与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开创了散文革新的先河，主张文学是为帝王与社会服务的，即为“文以载道”。而“文以明道”的提倡，使这类的议论文发挥了很好的效用，并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首先被影响的就是宋代的文人。而当时韩愈与柳宗元的作品当中也有这类的散文，例如《梓人传》与《朽者王承福传》等等。这些散文多是取材于下层社会，反映当时的民生疾苦并揭露出中唐时期朝廷的腐败，这类的议论散文为宋代的议论文开启了先河。（袁行霈主编，1999：304）北宋前期的文人在韩柳所奠基的基础下继续发展，并创作了一些议论当时社会现象与人物的一些议论文，而写这类文章写得特别优秀的当推欧阳修。在当时，欧阳修相当推崇韩愈的文章，故以此为基础，并写了《论杜韩范富》、《论狄青札子》等文章。与韩柳不同的是欧阳修在撰写这类文章的时候直接了当，直接说出心里话，就算对象是皇帝也不例外。（王水照主编、东英寿著，2005：22）在《论狄青札子》中，欧阳修写道：

臣闻人臣之能尽忠者，不敢避难言之事，人主之善取下者，常欲闻难言之言，然后下无隐情。上无壅听。奸宄不作，祸乱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祸，未发之机，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独言之，人主又能嘉而用之，则销患于未萌，转祸而来福者矣。（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2001：1655）

从上述引文来看，这是写给皇帝看的，目的在于劝谏皇帝要勤政，不要误信奸臣的谗言等等。这样的文章，皇帝不需要花心思去了解都能够直接知道欧阳修要对他说的话。这些文章的政治观相当明显，在当时的朝廷影响很大。（冯志弘著，2009：171）而欧阳修则是苏轼的老师，这些文章对于苏轼来说有着一定的影响力。苏轼所撰写的两汉人物论，是继承以及发展欧阳修的风格，然后产生出来的。例如欧阳修在早年所写的《贾谊不至公卿论》里提及“谊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2001：866），而苏轼就认为“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06）由此可见，我们可见看出苏轼是继承并发展欧阳修写作的方法。但是有一些不同之处，就是欧阳修直接了当，不畏惧地向直接向帝王进言；反观苏轼则是喜欢借助一些著名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为例子，从而加强自己的论点。（朱安义著，2010：26）总之，苏轼对两汉人物的描写与其写作风格，与欧阳修脱离不了关系，也证明了苏轼《进论》中的撰写背景与其老师欧阳修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节：苏轼《进论》中两汉人物甄选考量

在苏轼的人物论中可以按照朝代分为五个部分，即上古三代、春秋战国、秦朝、两汉、魏晋至唐朝。有关上古三代时期的人物论有《伊尹论》、《周公论》、《子思论》三篇；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论有《管仲论》二首、《孙武论》、《孟子论》、《乐毅论》、《荀卿论》、《韩非论》七篇；秦朝则有《秦始皇论》一篇；两汉时期的人物论则有《汉高帝论》、《留侯论》、《贾

谊论》、《晁错论》、《霍光论》、《扬雄论》、《诸葛亮论》七篇；最后则是魏晋至唐朝的人物论则是《魏武帝论》、《韩愈论》两篇。

在苏轼之前的历史人物多不胜数，他在撰写人物论时都会选择一些对历史较有影响力与参与过重大历史事件的人物。如诸子百家的学说影响了整个春秋战国的形势；在楚汉相争中，范增辅佐项羽；而张良辅佐刘邦，最后一统天下。贾谊、晁错的政策对后世影响深远等等。任何的历史人物，只有经历过重大的历史事件并针对当时的时势作出贡献，才能显示出其历史地位和功绩，当然也能暴露出其弊端与过错。只有这类的历史人物，才能为后人提供可靠的议论话题。从苏轼的角度来看，只有论述那些经过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为历史作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之功与过，才有较强的说服力，从而更好地发挥借古鉴今的作用。适逢当时是科举考试，更给了苏轼一个发挥的空间。在苏辙的《历代论》中提及：“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苏辙著，2009：1212）由此可见，苏轼所选择的都是有一定分份量的人物。两汉人物在苏轼的人物论里头所占据的篇幅共七篇，而这七篇人物论也体现出苏轼早年的为官之道。苏轼在撰写两汉人物论时都是体现出苏轼的人才观点，认为忍耐是当时当官的最重要因素，而苏轼本身也使用了他的一生来体现这些观点。

在第一节中，我们得知苏轼年少时期就开始阅读史书，乃至其历史造诣相当之高。但是苏轼从年少开始就没有什么朋友，更别说与朋友进行学术交流，反而苏轼与苏辙在一起读书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二人在书斋中读书，苏辙才会认为“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2009：160）苏轼在书斋中读书，为后来的科举考试作准备功夫，并不像司马迁为了编撰《史记》而游历四方。故苏轼在他的人物论当中的观点有脱节的现象，因为苏

轼不了解当时的局势，但也因为如此，他提出许多新颖的观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更是前人之未发。然而这些观点并不是完全是苏轼个人所创的，苏轼从小就对历史有着深厚的了解，再加上父亲苏洵的特别教导，乃至苏轼能够参考史书的评价，并加上自身的观点，从而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在当时来说，苏轼并没有经历任何的政制纠纷，也没有游历四方的经验，并没有对当时的时局有充分的了解。但是凭着苏轼惊人的理解能力以及对历史的理解，就连当时的文坛大家欧阳修也对他的观点赞叹不已，这是苏轼一个值得赞扬的地方。除此之外，苏轼在人物论当中所提出的观点并不是纯粹应付科举考试而已，从苏轼自求外任开始，就不停的实践他所提出观点，即“忍耐”。从苏轼被贬谪，入狱等等遭遇，若苏轼不是秉持着“忍耐”这个观点，恐怕就不能承受如此的重挫了。

苏轼在撰写与选择这些人物论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阐述自身的政治观点以及借古讽今。苏轼会以古讽今的方式来撰写文章，其中一项原因就是因为他苏洵。苏洵的《史论》三篇是影响最深文章。在《史论下》中，则是指摘《史记》、《汉书》的一些缺点。在编撰历史方面，苏洵是主张纪传体的，目的是追求“实录”。苏洵的主张影响了苏轼与苏辙。苏轼的史学，主要内容在批评方面，强调史实是为批评建立的可靠基石（王水照、朱刚著，2008：255）。就以苏轼的人物论而言，每一篇的最后都有苏轼对那位人物的评价，一般都与《史记》、《汉书》有明显的承接性。此外，苏轼撰写文章向来重实务而不虚务。他在《晁绎先生诗集叙》中道：“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却苦，言必中当世之过。”（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313）苏轼阐明了文章必须要拥有自身的价值，并起到劝世的作用。但是，在当今之世若写文章直接职责他人，势必得

罪皇帝与权贵，下场肯定是悲惨的。中国历代都有许多人因此而丧命。如果借古人或者是历史事件来对当今之世做一个反映，既不会得罪权贵，也能将自身的见解说出，实在是较为妥当的方式。而苏轼的人物论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来撰写的。

综合上述所论，苏轼只是在书斋中读书，却能够写出如此新颖的政治观点，同时也借助一些历史人物与事件，从而达到借古讽与表达自身的政治主张的目的，同时也使用这些主张以让苏轼在贬官时期心灵上得到慰藉。苏轼在《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霍光论》与《诸葛亮论》中以“忍耐”为主轴来撰写这些两汉人物论，以下我们将探讨苏轼在这些人物论中所表达的政治观点、借古讽今的倾向以及苏轼参考史书后从而发挥的论点。苏轼在《进论》中的两汉人物都有以一个主题为主轴，那就是一个“忍”字。而在七篇人物论中，笔者认为贾谊与晁错是不懂得善处穷时以及全其用，而非君主不能用他们，这就是两者最大的共同点；而张良与诸葛亮都是两汉时期最著名的“王佐”之才，但是他们所得到的成功却是不一样。笔者以为贾谊、晁错、张良、诸葛亮为本论文的主要论述人物原因是这四位人物都是当时朝廷的重臣、苏轼对他们的论述皆以“忍耐”为主、以及他们都对当时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有鉴于此，所以笔者将挑选着苏轼《进论》中这四位两汉人物进行详细论述，而其余的三位两汉人物皆会论述。

苏轼在《进论》中提及的两汉人物都有其特点，首先，苏轼在《汉高帝论》中提出：“有进说于君者，因其君之资而为之说，则用力寡矣！”（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81）苏轼就以利害的说法来论述刘邦。在当时的时势，若刘邦不这样做，就无法让群臣为他打江山，更别说统一中国。其次为《扬雄论》的

开端，就说明了“始孟子以为善，而荀子以为恶，扬子以为善恶混”（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11），也就是模仿孟子与荀子的主张，而自身的独创性相当少。确实，扬雄最重要的理论著述和文学创作都是模仿的产物，他思想观念中的重要内容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前人的思想传统。（王青著，2000：2）扬雄早期是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后来转为道家，所以他的思想与著述中儒道并存，而苏轼也认同扬雄的思想观念，认为必须将所学的融会贯通，才能提出全面的主张。在苏轼的人性观中，“善”并非人的本性，而是按照“道”的要求行事所表现出来的具体效果。性无所谓善恶，其性之善恶的表现，全在于后天的作为。因此，人生就是一个不停地追求善与表现善的过程；在圣人、君子与小人之间，没有一条天生的善恶界限，他们之间常常相互转换的。这就是苏轼“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观点。（杨胜宽著，2010，34）这也是苏轼论《扬雄论》最好的凭证。另外，苏轼也在文中提及：

愈之说，以为性之无与乎情，而喜怒哀乐皆非性者。是愈流入于佛、老而不自知。（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11）

而文中，苏轼说明韩愈认为人性与感情是没有关系的，喜怒哀乐都不是属于人的本性。韩愈曾经致力排佛，更有《论佛骨表》等排佛文章问世，但苏轼却认为韩愈已经陷入了佛老思想的范围而自身却不知道，就好像当时后的北宋，全都在自欺欺人，已经相当危险了却还懵然不知，还惦记着歌舞升平的糜烂生活，就像韩愈一样，陷入了佛老思想中却自己都不知道。

最后，苏轼也在两汉人物论中阐述了要成大事，必须具备一定的节气与胸襟，否则也是难以成功的。苏轼在《霍光论》里头就阐述了这一点。虽然一个人的才华可以使他成大事，但是在《霍光论》中苏轼就提出了才能并不是最重要的，而“节”、“气”才是最重要的，文中说道：“至于捍社稷、托幼子，此

其难者不在乎才，而在乎节，不在乎节，而在乎气。”（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09）在这里，苏轼看重的是“节”与“气”，在成大事的过程中这两点往往不才能更加重要。若一个人只有才，而没有节气的协调，那么这样的才能也只是能够让你成为争取利益的工具而已。（闫少鹏著，2005：4）另外。苏轼在《霍光论》中称霍光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也没有什么才能可言，即：“先无尺寸之功，而才气术数，又非有以大过于群臣。”（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09）但是却能够受到武帝的重用，并且在朝中没有人能够与他相比，即：

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杀之柄，威盖人主，而贵震于天下。……历事三主而终其身，天下莫与争。（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09）

霍光被重用的原因在于他“才不足而节气有余，此武帝之所为取也。”（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09）霍光不会以他的才能处处与人争长短，原因在于他的节气，所以才会受到武帝的重用。然而，苏轼在这里论证了“节气”就是一种长处。也就是一个人必须胸怀整个天下，志向坚定、无自私之心才能成就大事业。

第三章：在《进论》中贾谊与晁错的形象

在苏轼《进论》中，共有二十篇人物论，而两汉人物就占了七篇。苏轼在论述两汉人物的当儿也加入了自身的意见，让文章更加有议论性。除了应付科举考试以外，也是苏轼发表自身政治观的最好体现。在苏轼认为，为官之道除了要为百姓谋福祉以外，更重要的就是要洁身自爱，要懂得忍耐与善处穷时，否则纵使你有再高的才能也使徒劳的。以下将以《贾谊论》与《晁错论》为例，以论证苏轼在当时所提倡的政治观与改革方式。

第一节：贾谊的致用与处穷体现

《贾谊论》是苏轼借分析贾谊的悲欢际遇，阐述了自己的人才思想，既是对贾谊悲剧的总结，也体现了苏轼的人才观。正是这一人才观影响了苏轼的为官之路乃至其一生。纵观苏轼的一生，虽然宦海浮沉，大起大落，但他始终没有沉沦，没有堕落，而仍然光明磊落，圆圆满满地实践着自己的人才观念。所以，苏轼无论是在朝任官、陪伴在天子身边，还是远在他方，教化百姓，都能处之泰然，坦然待之。（郭来升著，2010：8）苏轼在《贾谊论》所体现的人才思想，可以归纳为：一为人才有时要“忍”与“待”，二为人才必须善处穷时，三为人才必须要全其用。以下将论述苏轼的人才观。

首先，从《贾谊论》里得知苏轼认为人才必须要懂得如何忍耐与等待。文中一开始苏轼就对贾谊作出了评价，即：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05）

苏轼也相当赞同贾谊的才华是相当出众的，是辅助帝王的人才，但是却不能好好使用其才能。在《贾谊论》中，苏轼有这样说过，曰：

夫君子之所取远者，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05）

在苏轼看来，古代的贤人士大夫之所以能够实现伟大的目标，成就伟大的事业，都是“忍”与“待”的结果。（郭来升著，2010：9）苏轼认为要闯一番大事业，“忍”与“待”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小不忍则乱大谋，这种状况在贾谊身上就能够明显地看出来，一经贬官，就认为自己怀才不遇，终日叹气，认为自己命不久矣，更作《鵬鸟赋》以叹之，试想一个思想那么消极的人如何成就一番大事业呢？苏轼有鉴于此，认为人才必须懂得“忍”与“待”的道理，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能成就大事业。在苏轼往后的政治生涯，屡次被贬官到遥远的地方，但是他丝毫没有气馁，这也是苏轼言出必行的实践。

苏轼还在《贾谊论》里，以孔孟周游列国都不被重用为例子，以论证其“忍”与“待”之说法早上古已经有人实践了。在文中有提及：

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05）

根据引文所述，苏轼利用孔孟为例子。因为孔孟当时周游列国，却没有一个国家肯接纳他们的意见，只要那个国家还有救，他们都会去游说当时的君主。无奈他们的学说没有人接纳，得到的事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是他们且能够有所忍耐与在等待接纳他们学说的人出现，若他们经过一次失败便放弃的话，根本不会有现在的至圣先师与亚圣，他们的学说也不会流传至今。

其次，苏轼还认为人才必须具备“善处穷时”的能力。在《贾谊论》中，苏轼有道：

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绦、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趫然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天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06）

在上述引文中，苏轼详细地分析了贾谊悲剧的原因关键在于不善处穷时。作为士人，升迁贬谪是正常的，朝廷的亲近与疏远也是正常的，关键在于你怎么看待，怎么处理。是以一颗积极入世之心处之，还是以一颗消极厌世之心待之，其结果截然不同。（郭来升著，2010：9）纵观苏轼的仕途并不顺利，屡屡被贬官，但苏轼坎坷跌宕的一生也验证了他是“善处穷时”的实践家。无论是被贬到黄州、密州或者是海南岛，他都有一套方法去应对，并且始终怀有赤子之心，寄望于朝廷，希望得到谅解；寄望于众大臣，希望能为其辩护。而贾谊在被贬后的态度没有苏轼认真，只是以一颗消极之心待之，所以苏轼才会评贾谊为“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06）

最后，苏轼认为人才要“全其用”，必须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时势能够造就英雄，所以环境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好坏。有鉴于此，苏轼在《贾谊论》中有提及：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06）

在这段话中苏轼指出人才要“全其用”必须有聪明睿哲不惑之主。若无，你将不能有所发挥。就以贾谊为例，引《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适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鹄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鹄曰“服”。贾生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司马迁著，卷八十四，1959：2496）

从上述引文就能够得知贾谊被贬长沙王太傅后，一直都不能振作，终日感慨自己怀才不遇，寿命将尽。贾谊作《吊屈原赋》与《鵩鸟赋》以抒发自己的感慨。贾谊早期从天子的近臣，一下子贬到离长安数千里之遥的异姓诸侯国当太傅，加之南方雨多潮湿，对于他这个一直生长在北方的人来说是很不习惯的，因此当贾谊心情之不快，都是可以想象的。贾谊在赴长沙国任太傅的途中，经过汨罗江。这也是屈原被放逐之处，屈原一生，忠而被谤，所以自己深感“国无人莫我知我”（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著，1999：160），而司马迁也提及“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司马迁著，卷八十四，1959：2486）屈原的这种情感，自然引起正在贬谪的贾谊的强烈共鸣，于是贾谊并写下了千古名作《吊屈原赋》来凭吊屈原。接下来，在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的时候，见一鵩鸟入贾谊的房间，认为不详，又作《鵩鸟赋》以抒怀。（王国兴著，1992：24）相信苏轼也明白这一点，综观苏轼坎坷的一生来看，与贾谊有着相当多的共同点。苏轼认为人才要“全其用”，仅仅有英明的君主是不足够的，还需要其他的外部条件，例如与朝中大臣的关系等等。但是通过科举入仕的苏轼从贾谊身上得知的并不是那么全面，因为他还没有真正经历过，所以没有很深的认识。事实上苏轼的一生不只一次受到皇帝与朝廷重臣的赏识，但是他始终没有“全其用”，其才能没有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同样的，欧阳修也相当赏识苏轼，并且认为数年之后苏轼的才能会超越自己，但是苏轼后来因受贬谪生活的影响，其成就不能超越欧阳修，甚为可惜。（郭来升著，2010：10）

在《贾谊论》里，苏轼举了十六国时期前秦君主苻坚为例，认为他才是好的君主，而王猛能够“全其用”终得苻坚的赏识：

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06）

上述引文是指苏轼认为像王猛那样的大臣才是“全其用”，可以让其主张用诸天下。反观贾谊的遭遇，他的遭遇就没那么幸运了，纵使有再好的才能，都无法发挥出来，以至郁郁而终，不像王猛那样可以受到君主的重用，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有题及：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於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绦、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於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司马迁著，卷八十四，1959：2492）

贾谊的一系列政策都没有被采纳不是因为贾谊的政策无用，而是因为文帝的远贤，以及朝廷元老周勃、灌婴等人的反对，他们仗着自己是朝中大臣，向文帝进言。因为他们都是武将，在战场上杀敌与攻城略地，为高祖立下不少的功劳，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就。而贾谊只是区区的一个文官，却有机会与他们并行三公之列，他们当然不服，所以才向文帝进言，以致让贾谊出任为长沙王太傅。另外，在苏轼对贾谊的论述中也陈其纵横之术，即他在《贾谊论》中也说：“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06）苏轼言贾谊，则以为当深交帝王大臣，然后再十年后便可以一展抱负。苏轼也是使用利害之说论贾谊，但贾谊最终都没有完成其心愿，导致其愤懑而死。

除此之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最后，司马迁有这样的一句话：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乌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司马迁著，卷八十四，1959：2503）

司马迁对二人的遭遇都深表同情，屈原因被流放，投汨罗江而死。贾谊以《吊屈原赋》来凭吊。贾谊吊屈原自伤也，内心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二人看似怀才不遇的遭际，亦是《史记》屈、贾和传之因。

另外，班固在《汉书》中也对贾谊做出评论，在《汉书·贾谊传》的最后，班固评曰：

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班固著，卷四十八，1959：2265）

从上述看来，班固与司马迁都同样认为贾谊是一个人才，而分歧点就在于司马迁认为，按贾谊的才能完全可以任公卿，况且文帝由此打算，但是却遭到当朝大臣的阻扰，文帝这个愿望不仅未能实现，而且逐渐疏远贾谊，使他止步于藩国太傅之任，未能至三公之列；而班固则认为，贾谊虽不至公卿，但其谋略已略行。

在司马迁与班固的观点来看，贾谊只是官位未达到公卿之列，但他所推行的政策在后世也继续被沿用。可惜的是文帝到最后都没有机会重用贾谊。但是在苏轼的观点来看，他认为贾谊是因为不能善处穷时以及没有耐心所以才导致

这个悲剧的发生。在笔者看来，将贾谊的生平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中期与晚期。而苏轼在《贾谊论》中着重在贾谊的中期与晚期并加以评论。对此，后人对此皆有不同的评价，有褒贬不一，以下我们将来探讨后人对于《贾谊论》之评说。首先，茅坤对此作出了评论，即“细观此文，子瞻高于贾生一格。”

（茅坤编，2010：3283）从茅坤对苏轼的评论来看，他认为苏轼比贾谊更高一筹，因为苏轼在被贬谪的时候充分发挥了“忍耐”与善处穷时等特点，就这一点就比贾谊来得优秀。其次为浦起龙在《古文眉诠》中说到：

惜其不善用才，正是深于惜才。读此文，须将贾生当作者前身看，间视一出，旷世相感，所以辗转惜之，神味绵邈如此。（转引自曾枣庄主编，2000：152）

根据上述引文所论，浦起龙认同苏轼的观点，认为贾谊不能全其用以及没有耐心，所以导致失败，同时也称赞苏轼对于史料的运用相当熟悉，游刃有余的表现。除此之外，对于苏轼在《贾谊论》里的观点，也有学者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张伯行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说明：

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断得甚确，足以服贾生之心，其行文爽快道逸，学者读之，则手腕自然灵妙。但中间代贾生打算一段，却欲其深交细、灌，使之不疑，十年便可得志，则是权诈作用。并将上面所引孔孟皇皇救世之心，都错看入此途去也。此最坏人心术处。读者勿徒爱其文，而忘其理之不正也。

（张伯行选编、萧瑞峰导读、张星标点，2007：153）

上述对于苏轼的评论是较为中立的，在点出苏轼文章高明之处的同时，也指出苏轼对贾谊评论的错误观点。在张伯行认为，若当时贾谊真的与细、灌等为伍，就算日后真的得志，也只是在运用诈术，不值得被赞扬的，并奉劝读者要有自己的观点，不要盲从苏轼所提出的观点。在张伯行的评论来看，也有可能是苏

轼只是在书斋中读书，对当时的局势没有深厚的了解，从而发表了自身的论点，导致后来学者的批评。然后，王文濡也在《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中提及：

亦自有见，但贾子陈治安之策，乃召自长沙独对宣室傅梁王后事，子瞻乃云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未免卤莽耳。（姚鼐辑、王文濡评注，1987：458）

这里说明了苏轼对于贾谊的评论，认为苏轼太过鲁莽，不应该妄加自己的意见。由此可见，虽然苏轼的理论点发前人之未发，观点新颖，虽然对后世来说是一种借鉴，与此同时也遭到许多学者的批评，有扭曲历史之嫌。但是笔者认为苏轼的立论点新颖，为后世学者带来的不同的参考，是文坛的一大贡献。

从上述的评论看来，无论是在苏轼之前的司马迁与班固，还是后世的学者，所评论贾谊都集中在贾谊的晚期。因为贾谊晚期被贬长沙，作了《吊屈原赋》与《鹏鸟赋》，从此自怨自哀，一阙不振，学者们就针对贾谊这是的情况加以评论，连苏轼也不例外。笔者认为贾谊晚期对他的影响固然是大，但是在早期与中期的经历也是不容忽视的。

综合以上所说，苏轼所认为的人才，必须具备四项条件，即“忍”与“待”，善处穷时与全其用，若有了这四项特征，则能像王猛那样，受到帝王的赏识与重用，而苏轼论贾谊，则批评贾谊缺乏具备以上的条件，即使才能再高，也是枉然。同时，苏轼使用贾谊被贬到长沙时自怨自哀德情况，讽刺当朝的官员以及当时的情况，虽然面对着强大的外敌以及内部的政乱，都不应该继续沉沦，反而要更加努力面对。

第二节：晁错“自全”的性格体现与实践

承上述苏轼对贾谊的论述，接下来与贾谊有共同点的两汉人物就是晁错。苏轼在《晁错论》里分析了晁错被景帝杀害的原因以及一推前人的观点，提出相当新颖的看法。在苏轼看来，一个有节气、才华与忠心的臣子，必须要以身作则，绝对不会将责任推卸给他人。在《晁错论》里提及：

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以辞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07）

上文之处，苏轼认为一个有识之士必须要有责任，自己所制造的问题自己要有办法解决，这样才能够给天下人一个交待。苏轼在一开始就阐明了他的立足点，上文的“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就是指七国之乱。景帝刚登基，晁错才上任没多久，这个时候却提倡要削藩，最后惹来杀身之祸。（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2010：367）若当时晁错能够沉得住气，待景帝拥有治国经验与养精蓄锐后，再来削藩也不迟。但是晁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也是晁错败笔的其中一项原因。而当时晁错却作出“自全”的举动，并提出要景帝亲自带兵打仗，此举也是晁错被处死的主要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晁错被杀后，后人都感到惋惜，并且认为他对汉朝的忠心程度是不容置疑的。无可否认的，晁错削藩的举措是要巩固汉景帝的中央集权，为国家的将来作打算。但是最后却遭到汉景帝的杀害，世人只知道是汉景帝的失误，误信了袁盎的谗言而将晁错处死，却没有想过晁错在当时的举动确实是让汉景帝误会的。（班固著，卷四十九，1959：2265）在《晁错论》里，苏轼一推前人的说法而阐述自身的观点：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察，以错为说。天下悲错之忠而受祸，而不知错之有以取之也。（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07）

苏轼在《晁错论》中指出处死晁错并不完全是汉景帝的错，其实晁错自身也有不善之处。当时七国诸侯以诛杀晁错为名，兴兵造反。而这时晁错竟然提出要汉景帝御驾亲征，对皇帝而言实属为难，而袁盎就是以此为借口，乘机向汉景帝进言，从而将晁错处死。这段史实在《史记》与《汉书》均有记载，在《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载：

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却。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喧哗疾晁错。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晁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及吾身。”死十馀日，吴楚七国果反，以诛错为名。及窦婴、袁盎进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司马迁著，卷一百一，1959：2747）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晁错因为要急于削藩，没有估计到诸侯们的利益，所以晁错提出削藩意见时，遭到了窦婴的反对。连晁错的父亲都来劝告他，但是晁错仍然一意孤行，最终落得处死的下场。然而《史记》的记载却不比《汉书》来得详尽。在《汉书·袁盎晁错列传》中就提出了晁错提议让景帝御驾亲征的情况，而补充了《史记》的不足，《汉书》载道：

吴、楚七国俱反，以诛错为名。上与错议出军事，错欲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后十余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欧劾奏错曰：“吴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庙，天下所当共诛。今御史大夫错议曰：‘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错不称陛下

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亡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制曰：“可。”错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错，给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班固著，卷四十九，1959：2302）

根据班固的记载，晁错当时上书给景帝，要求景帝亲自带兵去平乱，而自己却留守在城内以安其身。这样就会让人们误解，为什么要景帝亲自带兵呢？削藩是晁错的建议，如今激起各个诸侯的反抗，却在这时要求留守城内，不去抵抗各个诸侯，这也是景帝相信袁盎的一个原因，因为晁错此举实在令人难以信服。

（闫少鹏著，2005：4）苏轼认为，若晁错届时能够当机立断，做好防御工作，或许就不会惹来杀身之祸，在《晁错论》中，苏轼阐述了这一点：

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袁盎，可得而间哉？（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07）

苏轼认为，若晁错一意孤行，要景帝亲自带兵平乱的话，纵使没有袁盎的谗言，景帝也会找借口将他处死；若当时晁错能够毛遂自荐地领兵平乱，并且做好一切御敌准备，即便这场七国之乱的导因是因为晁错，但是他拼死护国，就算有一百个袁盎向景帝进言，也不能离间景帝与晁错之间的信任与忠诚。但是晁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籍着景帝对他的信任就肆无忌惮地提出削藩的建议，虽然出发点是为了巩固景帝的政权，是相当有远见的。但是并没有完全了解当时的局势，便贸然地提出，并且要景帝亲自带兵，自己却留守在城内，完全在逃避自身所犯下的错误。（吕晴飞主编，1998：1180）如果晁错能够学习忍耐与等待，说不定就能协助景帝收复这些诸侯。但是晁错就是不了解这一点而造就了他悲剧的下场。

除此之外，苏轼也认为像晁错这样鲁莽的“削藩”行动是不正确的，他在《庚亮不从孔坦陶回言》中说：

吾尝谓晁错能容忍七国，待事发而发，固上策。若不能忍，决欲发者，自可召王濞入朝，仍发大兵随之。吴若不入朝，便可进讨，则疾雷不及掩耳。吴破，则诸侯服矣，又当独罪状吴而不及余国，如李文饶辅车之诏。或分遣使者发其兵，诸侯难疑，亦不能一旦和从俱反也。错知吴比反，不先未削为反备，既反而后调食，又一旦而削七国，以合诸侯之交，此妄庸人也。（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2026）

在文中，苏轼并不反对“削藩”，但是他却对晁错的鲁莽行动不以为然。同时，苏轼也提出了两个方式，都是按照当时的时势所设计的，一是利用君臣的名义，传召吴王刘濞入朝，以便夺其实权，如他拒绝入朝，便可以名正言顺地讨伐他；第二是派遣使者到各个诸侯国，要他们出兵共同对抗吴国。即使他们不出兵，也会因为疑惧而不敢相助吴国起兵造反。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真正解决侯国问题的是后来的“推恩令”，即允许侯国之君再分封给他们的子孙，使侯国内部分割，中央便容易控制各个势力较小的单位，易为郡县。（王水照、朱刚著，2008：290）若晁错当时能够看清当时的局势，运用适当的手法去处理各国诸侯的问题，就不会演变成后来的悲剧了。

苏轼在撰写《晁错论》时，对晁错的评价是带有贬义的意识在里头，在文中写道：

嗟呼！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击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与？（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08）

苏轼对于晁错的评价毫无疑问地存在着贬义的气息，在里头除了对晁错安其身地举动作出抨击之外，还提出了自身的建议，即建议晁错亲自带兵讨伐作乱的诸侯，说不定会有成功的机会，但是晁错却选择了逃避，会得到如此的下场，也是晁错自取得。而苏轼的这段评价，却补充了司马迁与班固对晁错的评价，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晁错的评价是：

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後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讎，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司马迁著，卷一百一，1959：2748）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晁错当太子家令时，因为他的意见不被接纳，后来掌权后改变古代原有的法则。当诸侯来犯时，并不是第一时间想办法解决，而是在想办法私底下报复，后来报复不果反而惹来杀身之祸，这是相当可悲的事情。司马迁也认为随便更改古代遗留的法则，后果不是逃亡就是死亡，而晁错就是其中一个。而在此我们就能看出苏轼对司马迁评价的承接，即要亲自带兵，而放弃劝谏景帝亲征的念头，就不会被处死。另一方面，班固在《汉书》中对于晁错的评价虽有贬义气息，但是在最后还是念及他的忠诚而将他的事迹记录在史书之上，即：

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其父睹之，经于沟渎，亡益救败，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故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班固著，卷四十九，1950：2303）

班固认为晁错只着眼在国家的将来，并没有顾及现今的状况，而他的父亲就看得很透彻，为了避免祸害就服毒自杀。除此之外，班固还引用了当时秦国与赵国的长平之战为例，当时赵国打败，因为临时更换主帅，由赵括代替廉颇，乃至赵国败于秦国之手。但是赵括并没有得到诛连，是因为当时赵括亲自领兵

对抗秦国。而当时晁错并没有像赵括那样领兵，反而要求守在城内。（司马迁著，卷一百一，1959：2447）而苏轼所说的“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与？”（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08）则与班固对晁错的评价有明显的承接性，仿佛在补充班固的不足。除此之外，苏轼借用了晁错的时间来讽刺当朝的官员，面对着内有外患，仍然无动于衷，在《晁错论》中苏轼阐明：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07）

苏轼在文章的开端就这样感叹，这一句话也揭露了当时的北宋外强中干，在朝属忠心耿直的大臣相当少，全都是自私与各怀鬼胎的。虽然忠臣有向帝王进行劝谏，但是帝王仍然无动于衷，不思进取，导致后来靖康之难的发生。

苏轼对于晁错的评论是承司马迁与班固，并且加入自身的观点得来的，而苏轼评晁错的论点也为后世学者所接受。首先，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说道：

于错之不自将而为居守外，寻一破绽作谊论，却好。（茅坤编，2010：3287）

茅坤认为在当时的情况，晁错若迎战而不是选择退守城内，就不会让政敌有机会向景帝进言从而将晁错杀死。其次为孙琮在《山晓阁选宋大家苏东坡全集》里说到：

起作虚冒，便已笼罩全文，通篇只是发明冒中之意。盖七国之祸，自错发之，则深任其危而期于成功，才见任事方略。错之失计，在于已欲居守，夫已欲居守，所以自全也、岂知自全乃以自祸。篇中有写错罪状处，有代错画策处，有为错致惜处。以错之在汉亦有用才臣，特以一念之误，遂不免身婴大戮。英雄失足千古兴嗟，任大事者，尚其思坚忍不拔之义哉。（转引自曾枣庄主编，2000：155）

上述引文所述，孙琮认同苏轼的观点，若当时晁错肯迎战的话，就不会惹来杀身之祸了。他还认为，成大事者必须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这与苏轼所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另外，在《古文观止》里头较为相似的评价：

此篇先立冒头，然后入事，又是一格。晁错之死，人多叹息，然未有说出被杀之由者。东坡之论，发前人之未发，有篇中有写错罪状处，有代错画策处，有为错致惜处。英雄失足，千古兴嗟，任大事者，尚其思坚忍不拔之义哉。（吴楚材、吴调侯选编，1997：860）

两位学者与孙琮的观点相似，都是认同苏轼的观点从而批评晁错，认为只要晁错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与勇敢迎战的决心，定必逃过杀身之祸，但是晁错最终还是难逃被杀的命运。再次为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中也有对晁错进行评论：

凡做事要能发能收，方是大豪杰手段。苟其不然，反不如庸庸者之为愈耳。此文则晁错不自将以讨吴楚，是能发而不能收，宜来其谗言以速祸也。真老吏断狱深文，使晁错无辞可以解免。（张伯行选编、萧瑞峰导读、张星标点，2007：153）

上述引文所论，有能力发起事端就必须有能力收拾残局，但是晁错以“削藩”为口号，想进一步巩固景帝的权力，出发点是好的，由于损害了当时诸侯的利益，所以出兵反抗，这时提出“削藩”的晁错竟然要求景帝带兵，而自身却留守，才会惹来政敌的攻击，这不是大豪杰的所为。

虽然后世学者较多都认同苏轼对晁错的观点，但也有学者为晁错抱不平。在乾隆的《御选唐宋文醇》就提及：

七国削亦反，不削亦反。削则变速而祸小，不削则变迟而祸大，此世所以伤错之忠也。虽然明知削之则反矣，而不为备反计乎，四顾群臣既无可属百万兵而

可轻削之，以激其反乎，况有周亚父之可属百万兵而不知，孰云智囊也？（乾隆御选、张照等辑评，2005：638）

上文提及，当时的七国之乱早就酝酿已久，若持续地酝酿下去，将会一发不可收拾。晁错有鉴于此，所以提出“削藩”。晁错的出发点是好的，也可以显示出他对景帝的忠心，可惜到最后演变为悲剧。

根据上述学者们的论述，多数都是从晁错挑起战争而要求居守的情况下，对晁错做出评论。认为成大事者必须要以身作则，自己闯出来的祸乱就必须自己承担。只有少数的学者认为这次的战乱不能完全归咎于晁错，认为晁错为了巩固景帝的政权才提出这一项政策。但是笔者认为，晁错的出发点是为了整个汉朝不被异姓诸侯所控制，要进一步巩固景帝的政权，但是晁错没有等待时机，景帝刚即位，并没有完全熟悉当时的情况，就突然被要求“削藩”并且要亲自带兵，而自己却只求自全；而且也带有报复的心理。从这一点看来理亏的总是晁错，已经让景帝心寒。即使没有袁盎的进言，晁错也难逃一死，只是迟早的问题而已。（王国兴著，1992：486）另外，由汉代所继承的秦代官制，首先可以看出在设定之初，即含有一种可能性，乃是在与官制中的大部分来表现并维护皇帝的绝对身份，而非出自客观政治治理的需要上。（徐复观著，1985：220）晁错不懂得维护景帝反而要求景帝带兵出征，严重地侵犯了皇帝的地位，所以才会惹来杀身之祸。苏轼在《晁错论》中则引用“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勿务为自全之计”（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07）这里也说明了，若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政治成效，就不可以退缩。就像晁错那样，是不能做出好成绩的，苏轼以利害言晁错，体现出晁错“自全”的性格。

纵观上述所论，我们可以看出《贾谊论》与《晁错论》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苏轼都认为他们两个都没有看准当时的格局就贸然向皇帝提出自身

的见解以及一系列的政策，虽然这些政策在他们死后都陆续地被沿用，但是无可否认的他们都是相当有远见的有识之士，只是在不适合的环境下提出，从而遭到贬谪与杀害。总的来说，两者都是因为不能够忍耐，贾谊与晁错提出有损当时老臣与诸侯利益的政策，以至被贬谪与处死，如果他们当时能够善处穷时，对当时的情况有所忍耐，或许他们的政治主张能够在他们任官期间得到更完善的发挥。

第四章：张良与诸葛亮的“王佐”形象

苏轼对于一些经历过重大历史事件的人物论述是相当深刻的，尤其是“王佐”之才，即协助帝王的开国功臣以及对国家有着极大贡献的人物，而苏轼在两汉人物论当中，以张良与诸葛亮最为著名。苏轼在这两位人物论当中提出了不同的论述，首先对张良是极为推崇的，因为张良充分地体现出“忍耐”的特质，也因为这份特质以协助刘邦统一天下，反观诸葛亮，苏轼开始时则认为当时政局混乱，若诸葛亮能够发挥“忍耐”的特质，不使用计策将刘璋驱逐，继续打着仁义之师的口号，或许就能得到更多贤士的支持，从而协助刘备统一天下，但是诸葛亮到最后还是没有坚持，这就是苏轼对于诸葛亮最深刻的批判。苏轼利用了这两位人物从而提出自身的政治主张，以便达到借古讽今的结果。以下将以《留侯论》与《诸葛亮论》为例来论述苏轼对于“王佐”之才所具备的条件以及苏轼要表达的政治观点。

第一节：张良对于“忍”的发挥与实践

刘邦之所以能够建立汉朝，除了萧何、韩信等人之外，张良实在是功不可没。与上述的贾谊、晁错相比，苏轼比较认同的是张良。苏轼认为张良所以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除了自身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能够决胜千里的谋略以外，就是一个“忍”字。在《留侯论》开始时，苏轼就阐明了张良成功的关键，就是忍耐：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03）

苏轼认为成大事者应具备非凡的气度和高远的志向。张良的这种性格并不是天生的，而是靠后天养成的，在《史记·留侯世家》中记载：

良尝间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司马迁著，卷五十五，1959：2035）

张良在开始时确实想动手打那个老人，但是后来人下来，接下来一直忍下了老人对张良的羞辱，这时老人认为张良是一个人才，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在当中，涉及了浓厚的鬼神书写，认为这个老人是上天派下来协助张良的，司马迁在评语时表明“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司马迁著，卷五十五，1959：2049）但是苏轼却反对了司马迁这一看法，在《留侯论》中阐明：

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世人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03）

苏轼对于司马迁的看法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在当时是有着相当有学问的隐士，只是一般人看不出来而已，并不是鬼神在作祟。在秦汉之际，战乱频繁，若以冲动的性格行事，必死无疑。有鉴于此，老人要借机会提醒与教导张良，所以才会做出羞辱张良的举动，要让张良明白忍耐的重要性。（闫少鹏著，2005：4）苏轼在《留侯论》提及：

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04）

老人认为张良很有才能的只是担心其度量不足，所以要训练张良的耐心。张良果然不负所托，还得到老人的赞赏。自此之后，张良懂得忍耐的重要性，暴秦的苛刻与项羽的羞辱对张良而言都起不到作用，这要归功于老人的教诲。

苏轼在文中的最后以肯定的语气指出能够忍耐就是胜利者，并借刘邦与项羽为例子来论证此事：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苏

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04）

在楚汉相争中，项羽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他轻易地就让别人了解他的战力，从而让敌人拟定策略来对付他。但是刘邦却不同，就静静地等待遇忍耐，隐藏自身真正的实力，时机成熟时才一举消灭敌人这就是两者的差别。归根究底，这都是张良为刘邦所制定的策略。除此之外，张良教导刘邦要忍耐，不可轻举妄动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史记·留侯世家》均有记载，例如刘邦被困荥阳而韩信却在这时要求自立为王，刘邦相当生气，但张良却劝告刘邦要忍耐，结果事情还是迎刃而解；其次就是刘邦刚称帝，论功受封，但都是与刘邦有密切关系的人才能得到较高的职位，众人不服。但张良却献计给刘邦，将刘邦的仇人雍齿封侯，众人都放下心头大石，认为自己肯定能够拿到该有的赏赐。（司马迁著，卷五十五，1959：2043）从这一点来看，张良的心胸明显的广阔，刘邦自己也自愧不如。另外，苏轼对于张良的评语与司马迁大致相同，都是认为张良长得高大，岂料看了图画才知道他长得像个女子。司马迁引了孔子的一句话，即“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司马迁著，卷五十五，1959：2049）意思是不可以貌取人。而苏轼也是认为他的功绩与他的样子是呈反比的，苏轼在文中写道“此其所以为子房与”（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04），即这就是张良之所以为张良。其意思为张良的忍耐力与度量都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尽管他的容

貌像个女子，却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才能绝对远比那些长得高大雄伟的人优秀。

苏轼在《留侯论》当中，以一“忍”字为主轴。他认为张良之所以成大事是因为一个“忍”字。若张良当时散尽家财，招兵买马与秦始皇开战，一定必死无疑，就不用谈后来的丰功伟绩了。张良以忍耐立功，苏轼也在《留侯论》中大肆宣扬这一点，而苏轼本身就认为忍耐就是当官必须具备的条件，只要能够忍耐，就能像张良那样建立一番大事业。历来学者都对苏轼的《留侯论》做出了评述。历代学者对于张良的评说都几乎相似，都认为张良以“忍”而建立丰功伟绩。首先，吕祖谦在《古文关键》中提及：

格制好。先说忍于不忍之规模，方子房受书之事，其意在不忍，此老人所以深惜。命以仆妾之役，使之忍小耻就大谋，故其后辅佐高祖，亦使忍之有成。

（吕祖谦辑，蔡文子注，2002：118）

在《留侯论》里提及，张良之所以能够有如此惊人的忍耐力，全赖年少时期经由一个老人的教导，直到张良日后辅佐刘邦时，也常常教导刘邦要忍耐方可成大事。其次为谢枋得《文章轨范》里提及：

主意谓子房本大勇之人，唯年少气刚，不能涵养忍耐以就大名。如用力士提铁锤击秦始皇之类，皆不能忍。老父之圯下，始命之取履纳履，与之期五更相会，数怒骂之，正以折其不能忍之气，教之以能忍也。（谢枋得撰、原田由己辑注，

1980：17）

上述说明张良原本也是一个年少气盛的人，如果以这种性格入世，必定惹来祸端。有鉴于此，他的父亲就请老人替他教导张良，张良自身也受教，所以才会有后来的成就。再次为孙琮的《山晓阁选宋大家苏东坡全集》，里面提及：

通篇只重一忍字，所谓过人之杰而天下之大勇，即能忍是也。博浪一椎，子房几以不能忍致败。圯上倨傲，特以微窥其意，至于折节受书，而年少之气尽，王佐之量全矣。将古来绝世英雄，尽以忍之一字。（转引自曾枣庄主编，2000：148）

孙琮认为，古往今来的英雄豪杰都是靠一个忍字才能闯一番大事业，小不忍则乱大谋，张良在受挫之后几乎要对老人报复，但最终还是忍了下来，就表明张良有过人的能耐与才识，才能协助刘邦统一天下。康熙也在《御选古文渊鉴》中指出：

以忍字作骨，而出以笔快。岂子瞻心中先有一段议论，乃因留侯而发之耶？

（康熙御选、徐乾学等编注，2005：1206）

苏轼在两汉人物论中表达了他对为官的主要因素，就是“忍”字，这也证明了苏轼的政治主张不是凭空而来而来的，想必是经过一番摸索方可理解的。最后为沈德潜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中提及：

太白以博浪沙击秦，许以智勇，此又翻出子房之不能忍，而老人教以能忍。

（沈德潜选评、于石校注，1998：649）

从上述看来，除了有智谋以外还是不足的，必定要有一定的耐心才能成就大事。根据上述历代学者的评论，大部分的学者都只着重在张良的生平的前期，即张良年少时期的状况并加以评述。笔者认为，若张良在早期没有接收到那位老人的训练，可能就会在与韩王报仇的战争中阵亡。但是张良却虚心受教，最终为出色的王佐之才，建功立业。若没有早年的训练，又哪来晚期的丰功伟绩呢。所以在苏轼认为，“忍”是必须具备且要持之以恒的。

纵观上述所论，苏轼在人物传论中反复申明了他评价重要历史人物的一条基本标准，就是是否有“容忍”品性。苏轼在《留侯论》这篇文章中，把

“忍”字发挥得淋漓尽致。与贾谊、晁错相比，苏轼对于张良是褒多于贬，因为张良充分地发挥了“忍耐”的个性。对贾谊而言，刘邦也有不听张良劝告的时候，但是张良却没有放弃。例如在刘邦晚年之时，想废掉原有的太子并立戚夫人之子，即赵王如意为新太子，张良立即劝谏，刘邦虽然口头答应张良，但是仍然死心不惜地找借口废旧立新，但每次都被张良阻止。直到最后一次，张良也无力劝谏，就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封地去了。（泷川龟太郎著，卷五十五 1972：791）反观贾谊，只是向文帝提出自身的政治观念与策略，一不被重用，就气馁了，再也没有耐心去等待时机的来临，以致最后愤懑而死。对晁错而言，张良对刘邦的忠心不无容置疑的，并且不会要刘邦深入危险的处境。例如在鸿门宴上，刘邦以不胜酒力为由，没有向项羽与范增道别便离开了，留下张良代替刘邦向二人谢罪与送礼，成功让刘邦脱离险境，刘邦相当感激他。（泷川龟太郎著，卷二十一，1972：970）反观晁错的举动，自己献计要“削藩”，引起反叛后居然要景帝亲自带兵，自身却留在城内以安其身，这种做法与张良形成强烈的对比。（吕晴飞主编，1998：1173）另外，在刘邦统一天下之后，各个功臣都得到应有的赏赐，。张良随从刘邦出谋献策但无有“战斗功”，对此，刘邦说：“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之外，子房也，自择齐三万户。”（司马迁著，卷五十五，1959：2042）面对刘邦如此丰厚的赏赐，张良没有得意忘形，立辞不受，并对刘邦说：“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受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组矣，不敢当三万户。”（司马迁著，卷五十五，1959：2042）张良以恭谦之辞请求刘邦收回成命，另行封赐。刘邦也成全张良，改封他为留侯。从这事来看，张良十分清楚，若接受了刘邦三万户的赏赐，日后必定惹来刘邦的猜忌与群臣的谗言攻击，所以张良此举无疑是给自己留有一条后路。但

是韩信却不能了解这一点，还当众说刘邦带兵不过十万，而自己却多多益善，此举了犯了刘邦的大忌，日后伺机报复。刘邦惧疑韩信，由来已久，曾数夺其军，就是一个警示，所以收拾韩信是迟早的事，对此韩信相当清楚。故张良时刻都保持警惕，抱着“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刘笑敢著，2006，152）与“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的思想。（刘笑敢著，2006，268）在天下已定的时候，便离开朝廷，离开权势斗争、不参与杀戮功臣的斗争。从此我们就能得知，张良凭着这一点忍耐就能够在朝廷的斗争中脱身，从而避免了“兔死狗烹”的后果。（张大可、徐日辉著，2002：284）所以，苏轼在撰写人物论时也加入了自身的观点，认为只要忍耐与纵观时局，就能够成就大业，反之失败。以上三篇人物论就会以此为例，张良能够忍耐，最后就能建功立业，而贾谊与晁错因为缺乏这一点，从而酿成悲剧。

第二节：仁义诈力兼用的诸葛亮

在中国历史上的“王佐”形象约有两类，一类是导师型的，以伊尹、周公为代表；一类是能吏型的，以萧何、曹参为代表。而诸葛亮既有导师风范，又有能吏的才智，所以是一个全方位的“王佐”之才。（王水照、朱刚著，2004：268）

在当时，诸葛亮提出了夺取荆州与益州作为根据地的策略。荆州地域辽阔，形势险要，是“武用之国”，可是刘表昏庸而无力守护。至于山川险塞得益州，沃野千里，民殷国富，高祖刘邦就在这里成就帝业。可是益州牧刘璋暗弱无能，不善治理，诸葛亮认为这是上天留给刘备的根据地。如果刘备能够跨有荆益两州二州，即可与曹操、孙权形成三分天下的鼎足之势。这无疑是在协助刘备在

当时建立一个立足之处，是无可厚非的。（余明侠著，1996：82）但是，苏轼在《诸葛亮论》里却对诸葛亮的一些政策与谋略加以否定与贬斥。不过在经历过贬谪生涯的苏轼，他却对诸葛亮赞赏有加，与之前在科举考试里的诸葛亮形象截然不同。至于苏轼为何会有这样的转变，在此姑且不论。

众所周知，诸葛亮在三国鼎立之后为蜀国的宰相，在《出师表》中阐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刘禅的忠心。但是，苏轼却在《诸葛亮论》中否定了诸葛亮的这一份忠诚，反而把“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12）的污名挂到诸葛亮身上。苏轼认为，在当时的局势，以曹操实力最强，雄霸整个北方，但都是利用卑鄙的手段得来的。而当时的诸葛亮唯一的胜算就是凭着他的一点仁义之心，让天下的忠臣都纷纷投靠到刘备那里，这是当时他们唯一的优势，在文中道：

孔明之恃以胜者，独以其区区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闻孔明之风，宜其千里之外有响应者，如此则虽无措足之地，而天下固为之用矣。且夫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为，而后天下忠臣义士乐为之死。（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12）

苏轼认为，当时刘备与诸葛亮只是占领了小部分的领土，但是许多天下的忠臣义士都纷纷都靠刘备与诸葛亮，声势颇为浩大。但是，若诸葛亮为了协助刘备统一天下，光复汉室，必须借助其他异姓王的帮助，而刘璋将刘备接入益州，于是他们便乘机夺取益州政权以作为他们的根据地。苏轼对诸葛亮此举更是加以批评：

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夺其国。……孔明迁刘璋，既已失天下义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为仁义之师，东嚮长驱，而欲天下响应，盖亦难矣。（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12）

刘备与诸葛亮取得根据地后，便更加努力练兵，更号称仁义之师，以此讨伐曹操。但苏轼认为，你若真的是仁义之师，是不会夺他人国土为根据地，诸葛亮此举无疑是自打嘴巴，并且被认为是与曹操一样，都是使用奸诈的手段去夺得别人的国土。根据《三国志·蜀书》里记载：

先主自葭萌还攻璋，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二十六年，群下劝先主称尊号，先主未许，亮说曰：“昔吴汉、耿弇等初劝世祖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陈寿著、裴松之注，卷三十五，2005：916）

根据陈寿的记载，在建安二十六年，大家都劝刘备自称帝号，刘备不答应，而诸葛亮继续劝说从前吴汉、耿等人起始劝世祖光武皇帝称帝登基，世祖推辞不允，先后推让四次，耿纯于是向光武帝进言道天下英雄对他十分景仰，希望可以追随他。如果当时光武帝不答应，大家就另觅新主。世祖感到耿纯的话很在理，于是答应了众人的请求。现在曹丕篡汉，天下无主，刘备乃刘氏皇族的后裔，继承汉室世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苏轼却认为当时的诸葛亮判断错误，既然不能坚持以仁义立国，也不能完全发挥奸诈的计谋去离间曹丕曹植，这也是苏轼认为诸葛亮会失败的原因。苏轼在《诸葛亮论》里进行了论述：

孔明既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奋其智谋，以绝曹氏之手足，宜其屡战屡却哉。（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13）

苏轼认为诸葛亮不能够全其用，以致屡战屡败。原因是没有好好利用时机，以致到最后没有让蜀国统一天下，反而让曹丕打败。对年少时期的苏轼而言，他

对诸葛亮的评价是相当低的，以至于后来经历了人生低潮后，才逐渐欣赏诸葛亮的才华。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与苏轼的评价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国志·蜀书》载道：

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陈寿著、裴松之注，卷三十五，2005：934）

根据陈寿在《三国志》的评语，诸葛亮是一个抚恤百姓，诚心待人、尽忠职守的一个好宰相。凡是触犯了法律，不管是亲人与否，一律严惩；即使你对诸葛亮有多大的仇恨，只要你尽忠职守，他也一样论功行赏，决不偏私。虽然刑法相当严峻，但是却没有人怨恨他，因为他是用一个公平的心去对待每一个人。诸葛亮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相当好的人才，只不过它连年劳师动众，却未能取得成效，大概是随机应变，与武将的策略并不是他的专长，以致于失败收场，实属可惜。反观苏轼在《诸葛亮论》里却说到：

苟无以大过之，而又决不能事魏，则天下安肯以空言立动哉？呜呼！此书生之论，可言而不可用也。（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13）

苏轼的这一评价，就好像是衔接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虽然世人都认为诸葛亮是一个相当出色的谋臣与宰相，但是却因为做出了一些不义的举动，而导致苏轼对他的否定。认为苏轼的谋略只是空话，根本不可行。苏轼会对诸葛亮做出如此的评价，是因为苏轼在当时初入仕途，根本没有经历太多的人生挫折，所以才会如此。笔者认为苏轼之所以认为诸葛亮会如此的论述，因为他还没有经

历太多的挫折，所以认为只要以仁义为主，就可以得到各方的支持，也在反映这那时候的朝廷，奸臣们把持朝政，所以借此文以讽刺他们。

除此之外，在《诸葛亮论》中，仁义利害交错，可以看出苏轼在论述的时候其纵横气息相当浓厚。其主要是论述“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12）苏轼以为诸葛亮当初以仁义为主旨，号召天下忠臣效力刘备，但后来又以诈术驱逐刘璋，让天下的仁义之师失望。之后应该使用计策离间曹丕与曹植，但诸葛亮并没有使用这个计策，所以导致后来屡战屡败。这就是说诸葛亮王道霸术两失也。在《诸葛亮论》中，苏轼认为诸葛亮要执行王道时却失王道之机，应该要执行诈术时却又没有使出来。由此可见，苏轼的纵横观点是倡王道者不宜使用诈术，而崇诈术者不宜行王道。这就是王道与霸术之间的差别，话虽如此，但我们仔细阅读王道者的言语时，亦有功利的观念在里头，这也是苏轼在两汉人物论里的特别之处。然而，苏轼的纵横的观念，就是常常论述仁义利害的关系。（闫少鹏著，2005：4）南宋的朱熹曾经评苏轼说：“以利害为言，则终不近圣贤气象。”（朱熹著，2001：265）这是宋儒的一个看法，送入主张节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道理，所以批评苏轼以利害关系来表达自身的要求。

苏轼在《诸葛亮论》里头抨击诸葛亮以诈术驱逐刘璋，从而得到益州作为根据地。但是在当时的情势，若不以一些计谋来达到目的，根本无法与当时的曹操与孙权相比，在《唐宋十大家全纪录·东坡先生全纪录》中提及：

孔明隆中数语，足概平生。曹操不可与争，孙权可与为援而不可与敌，天下之大，所余几何？惟跨有荆、益保其严阻，抚和戎越，修好江东，则霸业可就，夫孔明岂不按天下之兴图，复高、光之文哉？亦限于势而已矣。（转引自曾枣庄主编，2000：195）

上述因为就为诸葛亮做出了辩解，认为收到当时的局势所逼，不得不使计驱逐刘璋，取其益州作为根据地。不然，则为曹操所灭，更别说是一统天下。所以诸葛亮不得不这样做，而在当时的苏轼认为这是不对的，是有违仁义的。（朱靖华著，2004：35）原因是苏轼还没有经历任何的政治黑暗与纠纷，到了后期苏轼对诸葛亮则是推崇的，这就是要经过一些经历才可以体会到的感受与对事情的观点也会有所不同。

纵观上述所论，我们得知苏轼早期是对诸葛亮的评价是带有贬义的成分在内。同样是“王佐”之才，苏轼对于张良的论述却是相当好的，是赞扬的，但是苏轼对于诸葛亮却加以批评，张良也为了协助刘邦称帝而做出一些不义之事，但是苏轼却忽视了这一点，因为苏轼认为张良不单只是一个有才华的臣子，更会看清时势而对刘邦献策，除此之外，就是张良能够忍耐，之后就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这是上述的贾谊、晁错、诸葛亮都做不到事情。由此可见，我们可以得知苏轼在当时的政治理想与憧憬，更能了解他早期的为官之道。

结语

综观全文，我们得知苏轼在初入仕途时期的文章风格与他对那时候政治的看法。当时的苏轼英态焕发，才华横溢，大有一展鸿图之志，所以文章显示出纵横掉阖，汪洋恣肆的风格。苏轼的两汉人物论所选择的都是对历史有一定影响力的人，例如诸葛亮、贾谊、晁错与张良等等。除此之外，苏轼善于借古人之事以论当今之世，做到了借古讽今的作用，而且苏轼的理论相当新颖，一推前人的看法，并且建立自身对两汉人物的看法，发前人之所未发也。苏轼的这种论述方式，主要是受其父亲的影响，其次就是他的老师欧阳修。苏轼在他们两个人的基础上，发展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想法，这也是以上两汉人物传里的论点。另外，苏轼在这写人物论里头阐述了自身对当时政治的主张以及为官之道。苏轼认为一个人必须要学会忍耐、善处穷时，以及全其用，只要等待时机的到来，就可以一展抱负。首先苏轼讽刺贾谊的忍耐力不足，稍有挫折就不再振作，以致后来愤懑而死，实在可惜。其次为晁错，苏轼认为晁错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不懂得观察时机与没有耐性，并且要求皇帝亲自带兵而自己却躲起来，乃至最后得到悲剧的下场。第三为张良，苏轼对于张良的评价是较为正面的，是赞赏的，张良具备了贾谊、晁错与诸葛亮都没有的忍耐力与胸襟，所以张良到最后才可以避免许多的祸害。而诸葛亮自身也是相当有才华的，但是却在当时的时局作了不适合的措施，导致不能够协助刘备统一天下。除了张良之外，苏轼赞赏的两汉人物还有霍光，认为他具有“节气”与相当广阔的胸襟，所以才可以在朝廷立足。苏轼在论这些人物的时候，同时也希望君主能够任用这些具有耐心与“节气”的人官，这样国家才会安定繁荣。这些都是苏轼在他年少时期的政治主张与思想，当时的苏轼没有经历过仕途的黑暗，把它想成相当美好的

事情，其实并不然。在嘉祐六年开始，苏轼开始了他的宦生涯，往后一直被贬谪，所以后来他对政治的思想也有所转变，对昔日的两汉人物的论述也有改变，而当中以诸葛亮最为明显。例如苏轼在《三国名臣》中说道：

西汉之士多智谋，薄于名义；东京之士尚风节，短于权略。兼之者，三国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2042）

苏轼这时对诸葛亮是赞美的，称赞诸葛亮兼具崇高的道德感和高超的谋略。但是按照诸葛亮早期所作的《诸葛亮论》中说他是“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112），对诸葛亮采取否定的态度；但是后来改变成为兼具谋略与气节。（王水照、朱刚著，2004：258）苏轼会有如此的转变，原因是经历过了贬谪的仕宦生活，充分了解朝廷中的尔虞我诈的斗争。早年的苏轼认为以诈术驱逐刘璋的诸葛亮是不对的，但是现在却觉得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若不是这样，恐怕遭受到祸害的是自己，所以朝廷中每一个都明哲保身并将所有的罪名推倒别人身上，这也是苏轼了解到的所谓官场黑暗。虽然，苏轼早年与晚年所论述的东西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够单凭这一点来判断文章得好坏，我们只能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苏轼的这类人物论以了解苏轼心情上的转变。而苏轼也在其贬谪生涯里体现出他所提出的各个论点，但是却不尽然。例如苏轼在贬到海南岛时，都是其忍耐、全其用以及善处穷时的表现。虽然说最大的分别是对诸葛亮的评价，从贬斥到赞赏，是一个相当大的转变，原因是当时苏轼以儒家的仁义角度去论述这件事，当然就不被允许。而后来苏轼经历过种种挫折后，才有所转变。然后，苏轼也曾经在《贾谊论》与《晁错论》中提及贾谊与晁错所提倡的政策虽然有利于帝王与国家，但是却损害了其他大臣的利益；反观当时王安石主张新法，苏轼等人也是大力反对。但是在熙宁期间，变法得以实行，而苏轼等旧派都被贬谪，这是正是苏轼体现出其人物论中观点

的时候。所以苏轼在科举考试时就已奠定了他的政治主张，只是在贬谪的过程中稍有变动，但大部分的主张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可见苏轼充分发挥“忍”的作用。（杨子怡著，2008：19）另外，苏轼人物论除了受唐宋八大家其他七大家的影响之外，也深受时代政治思潮的影响。这也是苏轼对人物论的观点改变的主要原因之一。总之，苏轼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以及他的人生经历造就了苏轼人物论的特点。当然，笔者认为在众多的两汉人物中，苏轼只论述了这七位，并不能代表苏轼对于整个汉朝人物的看法。而探讨苏轼的人物论的价值在于能够进一步了解苏轼的思维特点以及其精神结构。苏轼的散文理论具有“自出新意，不践古人”的一家特色，其散文呈现出“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艺术风貌。他的散文理论和散文风格与其特殊的生平际遇和思想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张大联著，2004：56）作为对苏轼前期的人物论研究，让我们有一个门槛，能够了解更全面的苏轼政治思想与主张。

另外，笔者认为苏轼《进论》中两汉人物的研究尚有可以在深入的地方，由于受到时间的限制，所以研究的范围只好着重在《进论》中的两汉人物研究。而笔者认为此题材是有继续深入探讨的潜能。在往后，笔者将着重探讨整个《进论》里的人物论，以这个为出发点，能够使我们综观整个苏轼人物论的面貌。除此之外，还能够从这些人物论当中看出苏轼心情的变化，将其分成前期与后期，将其对照并得出结论。笔者将这个作为下一个研究目标，冀望能为苏轼人物研究加上一份论文之分量。

参考文献:

一、书目

1. [汉] 班固撰（1959），《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2. 冯志弘著（2009），《北宋古文运动的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 高海夫主编（1998），《唐宋八大文钞校注集评·东坡文钞》，西安：三秦出版社。
4. [宋] 何筵撰、张明华点校（1983），《春渚纪闻》，北京：中华书局。
5. 洪本健著（2004）：《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6. 胡适著（1999）：《国语文学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7. 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著（1999），《屈原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8. [清] 康熙御选、[清] 徐乾学等编注（2005），《御选古文渊鉴》，长春：吉林出版社。
9. 孔凡礼著（1998），《苏轼年谱》，北京：中华书局。
10. 孔凡礼著（2004），《三苏年谱》，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1. 刘笑敢著（2006），《老子古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2. 吕晴飞主编（1998），《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13. [宋] 吕祖谦辑、[宋] 蔡文子注（2002），《增注东莱吕成公古文关键》，《续修四库全书》160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4. [明] 茅坤编（2010），《唐宋八大家文钞·苏轼文钞》，合肥：黄山书社。
15. [宋] 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2001），《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
16. [清] 乾隆御选、[清] 张照等辑评（2005），《御选唐宋文醇》，长春：吉林出版社。
17. 沈德潜选评、于石校注（1998），《唐宋八家文读本》，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8. 泷川龟太郎著（1972），《史记会注考证》，台北：艺文印书馆。
19. [汉] 司马迁撰（1959），《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20. [宋]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2004），《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21. [宋] 苏轼撰、[宋] 郎晔注、庞石帚校订（1957），《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
22. [宋] 苏轼著、王文皓辑注、孔凡礼校点（1999），《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
23. [宋] 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2001），《嘉祐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4. [宋] 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2009），《栞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5. [元] 脱脱等撰（2005）：《宋史》，北京：中华书局。
26. 王国兴著（1992），《贾谊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7. 王国兴著（1992），《陆贾晁错评传》，《贾谊评传附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8. 王青著（2000），《扬雄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9. 王水照著（1999），《苏轼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30. 王水照主编、东英寿著（2005），《复古与创新—欧阳修散文与古文复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1. 王水照、朱刚著（2004），《苏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32. [清] 吴楚材、吴调侯选编（1997），《古文观止译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3. [宋] 谢枋得撰、原田由己辑注（1980），《标笺正文章轨范》，长沙：湖南出版社。
34. 徐复观著（1985），《两汉思想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35. 杨胜宽著（2010），《苏轼与苏门文人集团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36. [宋] 杨万里撰（2003），《诚斋诗话》，《文渊阁四库全书》001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7. [清] 徐枋撰（2007）：《论语杂语二种》，《历代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38. [清] 姚鼐辑、王文濡评注（1987），《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台北：华正书局。
39. 颜中其编注（1984）：《苏东坡轶事汇编》，长沙：岳麓书社。

40. 杨子怡著（2008）：《韩愈刺潮与苏轼寓惠比较研究》，成都：八蜀书社。
41. 余明侠著（1996），《诸葛亮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42. 袁行霈主编（1999），《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43. 曾枣庄、舒大刚著（1999）：《北宋文学家年谱》，台北：文津出版社。
44. 曾枣庄主编（2000），《苏文汇编》，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45. 曾枣庄著（2006），《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6. 曾枣庄等著（2010），《宋代文学编年史》，南京：凤凰出版社。
47. 张伯行选编、萧瑞峰导读、张星标点（2004），《唐宋八大家文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48. [明] 张丑著（2003），《真迹目录》，《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49. 张大可、徐日辉著（2002），《张良萧何韩信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50.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2010），《苏轼全集校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51. 周楚汉著（2004），《唐宋八大家文化文章学》，四川：巴蜀出版社。
52. [宋] 朱熹著（2001），《四书或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53. [宋] 朱熹著（2008），《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二、学术期刊

1. 郭来升著（2010），〈苏轼《贾谊论》人才思想探究〉，《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一期，页8。
2. 曲桂香著（2007）：〈论苏轼传记文〉，《绥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三期，页59-60。
3. 闫少鹏著（2005），〈苏轼人物传论的思想内涵〉，《船山学报》，2005年第四期，页1-4。
4. 杨军：〈论苏轼对欧阳修书学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五期，页86-87。
5. 张大联著（2004）：〈苏轼的散文理论与散文创作〉，《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三期，页45-70。
6. 张昶著（2010）：〈苏轼与欧阳修关系研究〉，《吉林大学学报》，2010年第十期，页20-35。
7. 赵维平著（2003）：〈苏轼与北宋选举〉，《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一期，页18-19。
8. 朱安义著（2010），〈苏轼与欧阳修的师生情谊浅识〉，《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二期，页86-87。
9. 朱靖华著（2004），〈苏轼思想“自己构成自己”的三个阶段〉，《中国苏轼研究》第一辑（页23-55），北京：学苑出版社。